

# 「五四」的另一端：啟蒙意境的追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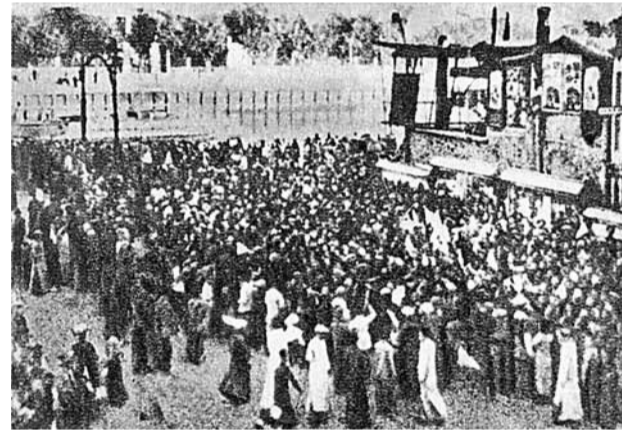


1919年的五四運動，經常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開端，有着神聖而固定的話語。在五四的意境解讀中，救亡，始終佔據核心的地位。然而，隨着歷史的變遷，使人們開始關注五四前後中國史的變化，啟蒙——這一價值的發掘，也逐漸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五四時期的集會



五四時期商人罷市



胡適雕像



法國大革命時期共和派處決國王

清末民初，在經歷了甲午之敗、庚子之亂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對西方憲政制度的推崇到了極高的程度。但面對着信仰的坍塌，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迷茫了，疑惑了，甚至開始絕望了。他們不約而同地思考着同一個問題：這究竟是為甚麼？

西學東漸，是中國近代以來的趨勢，知識分子在各式各樣的西學中吸取養分，又將這些半生不熟的理論應用在病弱的中國，動機未嘗不好，想法卻實在太過急切了。基於此，種種新鮮觀念和學說泛濫成災，種種思潮和流派紛墨登場，彷彿只要按圖索驥，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尤其是當中國政治重新退化到了四分五裂的亂世，知識精英們的「救世」之心愈發迫切。這種心態帶來了思想的空前繁榮，也令社會缺乏充分認知的年輕人的大腦燒得更熱……

## 多種思潮的流行

在很多人的眼中，「五四」運動只是一場學生的遊行示威，因為種種因素演變為一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但歸根結底，這還是一場知識分子表達願望的集會。這種說法未嘗不能解釋那一天中發生的種種事端，但若說可以概括全部，未免過於簡單。即使我們對那些耳熟能詳的政治意義避而不談，這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向前，我們可以看到歷經數年積蓄而成的文化、思想洪流；向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為了「救亡」和「強國」而進行的實踐。在這承前啟後的時點，「五四」轟然爆發，無疑成為了中國歷史不可忽視的坐標，這份獨一無二也成就了它永恆的意義。有基於此，在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走過93周年之際，解讀固然重要，紀念固然需要，還原則更加必要。

作為「五四」運動主角的知識精英階層，經過了「五四」的洗禮後，在關注點和話語主流上發生了一系列的嬗變：從關注政治（國家主義的盛行）到不談政治談文化（尋求文化建構和反省），再到不談政治談社會（無政府主義等宣揚社會實驗），最終談政治談社會（社會改造）。此時的精英們都是心性堅韌又堅持理想之輩，因此，在「五四」過後的十幾年裡，中國的精英們在全國各地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實踐運動。這之中的角色，既有學富五車的教授，也有年少輕狂的學子，更有老謀深算的政客……種種人物交錯間，一齣影響中國後世百年的話劇大幕徐徐拉開。

## 大眾語境的崛起

然而，在通常的認識裡，我們往往只看到了開頭，而沒有看到故事的結局。誠然，滄桑世道永無止境，但曾經的運動參與者們，那許許多多的政治人物的浮沉已塵埃落定，只看他們的經歷，豈能不令人對這場被渲染得無以復加的學生運動

增進幾分認識？學生們或許沒有想到，他們當時的一個出於義憤的舉動，竟會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這場學生運動和它前後數年的新文化運動合流，被後人從廣義上統稱為「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明確地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啟蒙的新篇章，還在於它作為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受到知識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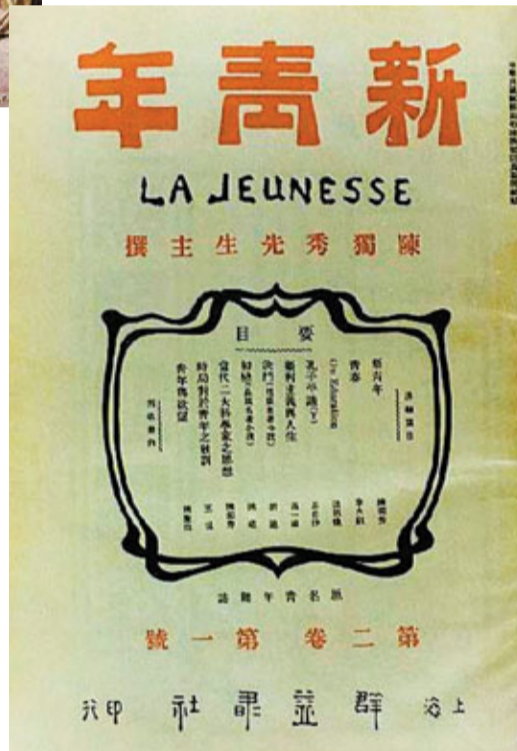
歷史的宏大與詭異在於，「五四」的意義詮釋，其實是在一個不斷擴大的歷史範圍中進行探索。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潮，是對學生與青年階層的思想洗禮，那麼，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運動學生」，也就是說，青年學子是作為思想的接受者這一身份，從先賢思想家或東西學大師們那裡汲取知識的養料。但是，五月四日的那一天，不再是「運動學生」，而成為一場後世廣泛讚譽的「學生運動」。這種轉變，是否代表着新一代人的成熟呢？

從新文化到「五四」，話語的轉變也意味着時代主題的轉變。「救亡」取代「啟蒙」，成為時代的主題。「救亡」與「啟蒙」的差別究竟在何處？救亡，強調的是解放國家，側重的是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啟蒙，偏重的是自我的個性獨立與自由，強調由自由主義優先的價值理念。兩種時代主題，後世學者，有人認為是相互補充、相互影響。但是，更多的人意識到了二者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伴隨着救亡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個體與自我已經淹沒在民族危亡的想像中。左翼的大眾主義與平民主義思潮，開始取代右翼自由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優勢地位，知識分子出現了自我貶損的傾向。

## 政治與文化的糾葛

以五四前後的大眾語運動為例，這場在近現代語言學發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學語言思潮，幾乎改變了中國人的語言使用生態。白話文的閃亮登場，寓意着精英的優越感被徹底打破。知識分子開始用大眾聽得懂的語言去詮釋生活的意義。因此，啟蒙的主體是精英，需要的是知識、文化與思想；而救亡的主體是大眾，需要的是團結、力量與民氣。五四之後精英的沒落成為一條主線，啟蒙成為時代的累贅，甚至抗戰爆發，救亡最終確立了無可辯駁的地位。

但歷史又是波浪形的，有高潮也就有低潮。歷史反思的旋律從來未曾絕響，人們對自我幸福的追求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渴望，最終構成了自我意識在歷史長河中的一次次反彈。啟蒙，雖然在表面上顯得力不從心與無可奈何，但是涓涓細流般的時代語言從來不曾消失。新時代的啟蒙，不再是精英的恩賜，而是成為了大眾階層的主動進取。可見，歷史雖然不能夠重複，但是卻在不斷地上演押韻的美感。



《新青年》



羅伯斯庇爾

五四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時代，因為人才輩出並具有非凡的意義。「五四」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幾乎因果難分。1919年的中國社會，文化革新終究不能代替政治革命。然而，沒有文化意義上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必然缺乏足夠的精神條件。「五四」時期一波又一波的論辯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可輿論之風主要仍在知識階層，其影響和作用也基本上局限於城市及少數文明發達地區的知識階層。只有因此帶來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精神崇拜相關的文化轉變，才真正改變了每個民眾的一點一滴。

利。從那以後，法國才真正進入了完全意義上的民權時代。

可見，啟蒙，是一個歷史的潮流，也是必然而無法迴避的歷史課題。若缺乏了啟蒙的奠基，任何社會變革或是歷史轉型，都會成為不完整的音符演繹。如今，「五四」的符號，已經成為了一個神聖而不可動搖的象徵，但是，探求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國藍圖，則五四的意境與價值的發掘，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五四的認識，見證了中國歷史的變遷，也可印證每一個中國人對自身利益與國家前途思考的轉變。

■文：徐全

## 法國歷史的反思

回溯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讚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在這場劃時代的變革中，也同樣存在着所謂「逆潮流而動」的不合時宜的人。比如，當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旺代地區的農民喊出了「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國王意味着甚麼呢？在當時的法國農民眼中，國王，是精神的寄托與象徵，是法國文化的傳承，是歷史符號的寄托，更是信仰人格化的表現。

### 共和的反調

無疑，任何試圖摧毀國王權力的變革，都會被農民們視為是歷史的倒退，無論在情感上還是道德倫理上，都顯得反叛而不

可饒恕。因此，巴黎的革命，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心靈的洗禮，相反，他們拿起了武器，與推翻帝制的革命軍進行了殊死搏鬥。

此刻，共和派所主張的自由、平等與博愛，全然不再適用於這些「落後於時代」的農民。對國王的擁護，就是對共和的背叛，故鎮壓是殘酷而血腥的。在共和與自由的名義下，革命軍瘋狂殺戮支持國王的法國農民，弄得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 啟蒙的失落

這種共和主義的「悖論」，曾引起法國知識分子的警惕。在雨果的小說《九三年》

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着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一觀點，在疾風暴雨的社會洪流中，並不引人注目。但是，當最為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掌握政權、利用共和制的機器大肆殺戮政敵與民眾時，人們才忽然意識到法國的歷史陷入了循環的漩渦。為何一場為着追求自由與民主的革命，最後成為了同胞間的無情殺戮，以至於在1814年波旁王朝復辟時，人們是滿心歡喜地迎接國王的到來，彷彿劫後餘生一般？毫無疑問，這是啟蒙思想普及的缺失。進步與保守只是精英之間的爭論，但是並沒有成為一般民眾進行利益選擇的考量，因此，儘

管少數的知識精英或是貴族階層接受了新事物的熏陶，但是，傳統社會結構下的一般民眾，仍然生活在舊有的思維框架中。所以，當時代發生巨大的改變時，這些與新思潮格格不入的人，會站起來進行全面的抵抗，以求捍衛傳統的價值與道統。法國大革命後，這個國家的歷史一直處在動蕩之中，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大眾階層開始慢慢接受了啟蒙的價值觀。到了1894年，當法國陸軍試圖以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作為替罪羊而承擔叛國的責任時，遭到了包括左拉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反對。在這場民族派與自由派的對決中，自由派最終以人性和正義取得了最後的勝